

文史資料選輯

內部資料 妥為保存

第十二期

025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
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

月
100

編輯說明

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，供領導審閱以及工作組工作上的參考，并推动撰寫資料工作的开展。選輯所收史料大部分系提供人亲身活动和見聞，凭記憶所及和依据一定資料追記而成。由于各人条件的局限性，所述史料不尽詳实，观点可能不尽正确，仅作內部參考，請勿外傳。

二、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國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，文字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的都将斟酌選入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。

四、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、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- 北洋見聞录 惲宝懿 (1)
- 国民革命軍第十軍参加北伐經過概要 王光汉 (22)
- 回忆江阴封江战役 欧阳景修 (47)
- 有关构筑江阴封鎖綫的一段回忆 葛克信 (52)
- 旧中国的常关 王兆楨 (56)
- 国民党軍隊中的“点放” 张庚金 (65)
- 江苏旧司法界幕內見聞 倪耀奎 (74)
- 绍兴墮民被压迫和斗争的片段 陈延生 (91)

这个材料有用么

北 洋 見 聞 錄

惲 寶 惠

張勳復辟前後黎馮間的联系

一九一七年黎元洪與段祺瑞因對德參戰問題主張不同，引起齟齬，黎免去了段的國務總理，釀成督軍團之亂，豫、浙、魯、陝等各省相繼宣告獨立。黎召張勳入京調停，結果被迫任命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，副署了解散國會命令，我從回憶中，想到在黎未召張勳入京之前，還有與馮國璋的一段關係。事情經過是这样的。

當督軍團宣布獨立以後，黎孤立無援，坐困愁城。他想到馮國璋坐鎮江寧，可以左右大局。某日召公府秘書惲寶惠①到春耦齋，詳談了外間局勢，黎說：“當前局勢，只有馮副座出面，才能得到解決，請你趕快到南京，面請馮副座出而解圍”。惲寶惠在第二天正預備動身，早晨又接到公府電話說：“相國（徐世昌）聘老（王士珍）請您趕緊到府，有話面談”。惲到了公府，在頤年堂與徐、王見面，所談與黎相同，兩人并催惲即刻動身。

惲到南京，面見了馮國璋，轉達黎、徐、王三人意見。馮說：“我決不會跟他們一同胡鬧，即秀山（李純）、子春

（王占元）我也可以叫他們不要有所表示（即是不獨立），但我與芝泉（段祺瑞）一向有意見的，我不便向他說話，即說也必不聽。”馮的這番話，就是謝絕了出作調人。憚只得趕回北京，向黎和徐、王復命，前後往返六天。

黎所期望的馮國璋這條路既走不通，徐、王也就沒有辦法，黎這才想到了坐鎮徐州的辦子大帥張勳，于是有明令召其北來調停之舉，因而發生了復辟之變。張勳存心復辟，事前人人皆知，所以當時的輿論，都認為黎之召張无异飲鴆止渴。

復辟變作，黎元洪由中南海出走，避居東交民巷。當晚黎所最親信的副官唐仲寅匆匆來到憚寶惠家中，對闖者不肯說出姓名，只說：“憚秘書見了我自會認識的”。憚見唐后，始知黎已住進法國醫院。唐傳黎的話，叫憚去醫院一趟，說有要緊話講。次日早由唐伴送憚到醫院。黎一見面就說：“民國中斷，負疚滋大，今請副總統依大總統選舉法，遇大總統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總統代理之規定，執行總統職務”。并說：“總統大小印五顆②已交丁衡三將軍（丁槐），秘密由海道携滬轉交副座”。憚辭出后，因交通困難，設法由京赴津，搭太古公司輪船赴滬，轉到南京。那時段祺瑞已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勳，并就國務總理之職。馮國璋也已于七月七日在寧就代理大總統職，以虞電通告全國。憚見馮后，雖將黎意轉達，但已成明日黃花。外傳馮對復辟本存觀望，憚到南京轉達黎意后，才表明態度，這是與事實不

符的。

馮國璋于八月一日到北京，惲寶惠也隨同到達，仍任公府秘書。馮到公府翌日即偕惲到法國醫院訪黎。後來即由惲寶惠、丁士源兩個人，護送黎元洪到天津，度其寓公生活。

故宮內的“小朝廷”

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的統治，但由於有了所謂清室優待條件，而此後執政的人物如袁世凱、徐世昌、段祺瑞、曹錕、馮國璋等，又都是清朝舊臣，對清室更優禮有加，尽管優待條件規定溥儀應該移出宮禁，他却始終沒有履行。他不但保持了她的“皇帝”稱號，且在宮內還沿用着宣統年號，並不奉行民國正朔。這樣，在北京就留下了一個“小朝廷”。

袁世凱任大總統時，他為了表示不忘故君，遇到農曆歲首，或是“萬壽”，自己雖不便到清宮去，却派大員用“外國使臣”禮節到故宮祝賀。我還記得隆裕皇太后的生日，我父親由於我的勸阻沒有到清宮去祝壽，後來聽說袁世凱曾以大總統名義，派國務總理趙秉鈞和梁士詒等前往祝賀，心里感到很難過，當時把我責備了一番，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

隆裕病死，袁世凱曾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，軍民人等左臂纏黑紗二十七天。我那時還在北京學校讀書，當然也不例外地纏上了黑紗。袁世凱除了派員致祭外，還舉行了“國民

哀悼大会”，我由学校师长率领，随队到太和殿参加了大会。记得主祭的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。民国政府既如此隆重的追悼那位“大清帝国”皇太后，北京各界也都纷纷举行了“哀悼会”。等到隆裕“梓宫奉安”，一切仪仗礼节，与清朝时代并无二致；西车站特备专车送至梁格庄西陵；遣老旧臣除随送到西陵者外，都到车站跪送。我又随学校队伍到车站恭送。当我看到了那些穿戴清朝服饰的遗老们跪拜哭嚎的时候，真不知自己置身在什么朝代。当时北京有的市民竟称之为“国丧”。记得那时报载张勋通电也竟用了“国丧”字样。至于“小朝廷”中，当然更是一切依照旧例办理。溥仪对满族“王公大臣”并降旨“赏”穿孝服一百天，着逢祭轮流入内哭奠。遣老旧臣当中如徐世昌、陈宝琛、袁励准等也都奉“旨”赏穿孝服。我还记得袁励准在奉旨“赏孝”之后，曾对我父说了这样的话：“这次特需恩赏，真是异数”。

在这里，我又想到了珍妃的移葬。珍妃之死，是在庚子七月西太后与光绪西幸的前一天，由西太后命太监崔玉柱推入井中的。隆裕死后，有的老臣想起珍妃尸棺曾在联军入北京后葬埋于京西田村，就建议袁世凯把珍妃的棺木也移葬到梁格庄。这事得到了袁的许可，当由京兆尹派员会同清室，在田村寻到她的坟墓，用清朝贵妃礼将棺木移送，进阜城门，出正阳门，然后装上火车移殯梁格庄。隆裕埋在光绪的左边，珍妃埋在右边。“小朝廷”为此还曾派世续向袁世凯申谢，袁当时说：“我是大清旧臣受恩深重，这件事办妥，我

可以对德宗稍报知遇于万一了”。

溥仪在神武門內，虽然是关起門来做皇帝，但并不寂寞。不但逢节逢寿有他那些滿族“王公大臣”和遺老旧臣照常朝賀，民国文武官員如徐世昌、赵尔巽、王闓运等也都公然到宮朝見。記得西南軍閥陆荣廷到北京时，也于見过了总統之后，就去拜見溥仪。至于张勳和那些复辟派更不必說了。去見溥仪的人們公然穿戴清服，行跪拜大礼，口头称臣。只有以中华民国大总統代表身分前去的才行三鞠躬礼。所以在北京城內，翎頂輝煌，坐着馬車，招搖过市，成了司空見慣的一种怪現象。

溥仪在小朝廷內，还公然頒布“上諭”，賜諡、賜寿、賜祭等等例子太多了。我只举他对我父亲賜祭的一件事，我父名毓鼎，是前清翰林，当过日講起居注官、侍讀学士。他是在清朝宣統初年乞休的；对前清來說，是一位遺老。一九一八年我父逝世，袁勵准、宝熙、馮恕、陈宝琛等一致主张，呈递遺折。我們当时是不能提出不同意的主张的，遺折由袁等代办，据他們說，并可以請諡。过了几天，溥仪的“上諭”頒布下来了，賞給“陀罗經被”，賜祭一坛，并派“內务府大臣”紹英致祭。袁勵准还特別郑重地前来，說賜諡查与定例不符，所以沒能邀准。在“上諭”下来的头一天，徐世昌先以大总統身分頒給了匾額，另以同年身分送致挽联。这样就在灵幃之前，既有了民国大总統的頒賜，又有了“大清皇帝”的頒賜。大小朝廷，互相輝映，这就是因清室保存帝号，

而产生的两个政府并立的怪现象。說到賜祭，那更是完全恢复了清朝体制，紹英被称为“天使”，摆出旧仪仗，着上旧服装。在那短短的几小时中，人們又几乎忘了是身在民国时代了。

溥仪这样的举动，不但施之于滿清王公，遣老旧臣，而且还公然施之于民国官吏。如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赵秉鈞，直隶省长的朱家宝等，在死后也都接到“上諭”，賜祭賜諡。至于追贈三代封典，頒賞福寿字和春条等等，更是一应按照清例。溥仪这样做，就给不少人留下了“不忘故君”之思，用意是弥长的，终于演出了一幕张勋复辟的丑剧。这也就是北洋政府任令这个“小朝廷”存在的一个后果。

复辟失败后，討张军队进至天安门和神武门的时候，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馮玉祥曾建議曹錕說：“斬草除根是时候了”。可是曹錕却說：“我們都是清朝旧臣，此事重大，須請示段总司令”。这样便又把这个“小朝廷”保留了下来。

溥仪在复辟失败当时，曾經作了第二次“退位詔书”的准备。他还派世續向国务院洽商公布的手續。那时的大总统是馮国璋，总理是段祺瑞。这两位清朝旧臣为了維持清室优待条件，认为再来一次退位，就不妥当了。在他們商議之下，把复辟的责任完全推到张勋身上，由清室内务府函达内务部，否認清室曾参加复辟行为。馮国璋就下了一道命令，替溥仪开脫了罪責。

由于北洋政府的放縱，溥仪不但不知悔过，而且仍旧关

起門做皇帝。神武門內朝見如故，頒布上諭，賜諡褒忠，也未變舊例。從對我父賜祭一例，可見一般。還有一件事，順便談一下：馮國璋到北京來接任大總統，溥儀派溥倫代表到站歡迎。馮曾做過清朝禁衛軍軍統，對於故君派員迎接，感到深仁厚澤，就在他就職後，派內務總長為代表，以大使禮節，謁見溥儀，答謝“皇帝”派員歡迎的盛意。據說當時一方是高呼敬問“大清皇帝安好”，一方也高呼敬問“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安好”。

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，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，才結束了這個“小朝廷”。但當天北京城內起了很大的波動，清室宗亲和遺老舊臣，以及頑固守舊的人們，無不同聲對馮譴責。對鹿鍾麟執行驅逐命令更是痛恨，因而有鹿進宮盜寶、發財致富的種種傳說。

欠薪與災官罷公

北洋政府的財政始終紊亂，無從整理，大部的開支全靠借債應付。軍政各費經常地鬧飢荒。單就官員們的薪俸而言，大約在民八民九的時期，就開始不能按月按時發放，（當時規定發薪日期是每月二十六日）。後來就變成按月只發幾成，更進一步便欠而不發。首先欠薪的是教育、司法部門，其次是當時目為閑散的衙門。據我所知，除了財政部是主管財政的、交通部是有路款收入的、外交部有關余調濟、稅務處有海關的關係、總統府有崇文門的稅收專款等之外，

其他各部院大都不能按月发薪。最严重的时期，竟連維持地方治安的軍警薪餉也都欠发了。各机关欠薪情形各有不同，有的隔几个月发一个月，有的若干月发几成。这要看本机关能不能設法自筹，不能自筹的欠得就多。

当欠薪开始的时候，我正在內务部。先是隔两个月发一次，后来随着政費打折扣，薪水也打折扣。不但折扣，而且变为逢年过节发几成。我記得有一次五月初五端午节，本部就发了二成薪水。所以当时有災官之称，从此可以想象到糟到什么地步了。

內务部是没有收入的衙門，处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設法自筹，是不大容易的。但人急智生，竟轉到皇城的念头。于是借口便利交通，擇可拆的地方拆墙出突砖瓦，突一段，发几成。有一个时期，按月可以拿到几成薪。这样就引起个别机关的指責，不能經常地去拆卖了。災官們的忍耐性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，就紛紛起来索薪。

索薪的行动首先从在部內組織索薪团开始。对内向本部主管索、对外向財政部索。一部如此，部部如此，災官們行动一致起来；索薪得不到結果，就酿成了罢公风潮。第一个封印罢公的是教育部。內务部虽然也响应罢公，但由于参加索薪团的都是科长以下的职员，重要的公事还能照常处理，只形成了一种怠公的状态。有一天索薪团召开全体大会，会商应付办法，司科长均避不見面。群情激憤，便蜂拥到总次长室去面見总次长。当时的总长田文烈还没到部，次长何煜

勉強出來，囑推舉代表談話，我也被推為代表之一。何煜不問情由，向大家嚴詞告誡，說什麼不守官規，有玷官箴。站在門外的人听了，沒等代表說話，一聲呼打，大家就蜂擁上前。何煜知道惹起了眾怒，連呼：“大家不要誤會，我一定請示總長立刻想辦法”。這時雖然有一位秘書護駕，但也挨了几拳，即抱頭鼠竄，逃出部去。內務部就在这天封印罷公。相持了五、六天，發了一个月的全薪，才結束了罷公的风潮。官闔風潮，本出于一时的激憤，以后虽然照旧欠薪，也就安之若素了。主要的还是怕丢官罢职。我所經歷的內務部情形如此，其他各部情况也大致相同。

我当时还在全国烟酒事务署供职（內務部是兼差）。因为本署是主管税收的机关，本来不欠薪。督办姚国楨到任以后，竟渐渐地欠起薪来，据說是由于負担了执政府公費之故。在各机关索薪罢公风潮影响之下，本署当然也不例外地起而索薪。这里我就記憶所及，敘述本署索薪中間的兩件事。

其一，当我们索薪的时候，署长张我华忽然請我們部分实缺人員到他家里吃飯。飯后他對我們說：“署中不是沒錢，所以不发薪資的原因，是为了姚督办預备报效段执政，同时他还要敷衍馮玉祥。你們必須直接向他索薪。封印罷公，別的部能做，我們也可以干，有我支持你們！”張的話虽然使我們感到突然，但是在欠薪情勢之下，本来就怀疑姚国楨为什么会发不出薪来，一定別有原因。經張一談，大

家就在第二天把张的話向同事們透露出来，一唱百和。姚一到署大家就跑进去，提出发薪請求。姚国楨比較識相，一見面就說：“你們的來意，我知道了，我正在設法，三兩天一定可以发薪，你們不要着急！”这样，大家鬧不起来了。张我华又把我們找去說：“姚的話靠不住，能不能就发的關鍵在第一厅长，你們應向他要保証！”我們听了便去找那位厅长。他的态度与姚不同，說什麼你們不要胡鬧，督办對你們很客气，应当誠相点，再鬧是沒好处的。这就把大家搞出火来了。当时一面把他包圍，由大家輪流看守，不发薪不許他离署，一面开会宣布罢公。次日张我华却以調人姿态出現，与姚商量將署內靠近邮政总局的房地出售給邮局，以所得发薪。他倒劝大家鎮靜，先恢复办公。事后我們才知道张、姚有嫌隙，张利用我們与姚以难堪，而我們竟被他利用了。

其二，姚国楨应允卖房地发薪之后，不久就传出了警备司令部扣留姚震的消息。我們当时觉得这或由于政治上的关系，可是署里卖房地的事已經成功，却没有发薪消息。我們又向张我华探問，才知道是警备司令部听說卖房地，向姚要求將全数价款拨充軍餉，姚沒答应，于是由司令鹿鍾麟請姚震到部，予以扣留。姚震是姚国楨的哥哥，营救的条件，当然就是答应拨款，姚震出来了，我們的薪水却落了空。警备司令部行同綁票勒索，吓坏了张我华。所以在这次，他却劝大家不要輕举妄动，以免引起其他事故。

案薪罢公风潮虽然鬧了很久，但是并没有解决了欠薪

的問題。各机关更采取了分化手段，对經常办公的和高級官員，暗中不时发給二、三成薪。”这样小恩小惠，就把風潮和緩下来。時間一久，大家反以发薪为例外，欠薪是正常了。因之当时的报纸把发薪当作重要新聞发表，如某部某日发薪几成等等，真是空前未有的笑話。

一九二七年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，接收了北京政權。他首先实行裁汰冗員，用减低薪俸办法，由財政部按月发薪。旧欠的暂时不算賬，新的不再欠。这样，几年来的欠薪問題才算暫告解决。我在烟酒署原来的薪俸是二百四十元，新的規定是荐任官一律支給一百六十元。虽然减了八十元，可是按月可以拿到。所以当时不但不觉得减薪，而且是欣欣然有喜色了。

在这里我又回忆到一件事。張作霖有一天在怀仁堂召集各机关荐任以上人員訓話，他说的话很多。我記憶到的有下面这些话，他說：“你們这几年太苦了，以前的长官不顧你們的死活，把你們搞成了災官。我張作霖不能看你們那样过下去，現在我从东北老家带錢来。你們的薪俸算起来是减低，可是我張作霖可以保證按月給你們。就是旧欠的薪水，也不是一笔勾銷不管了。只要我把‘赤匪’（按指蔣介石的北伐軍）打平了，財政有了办法，还是要算給你們的。人家說我張作霖是胡子，不管是什么吧，我說一句算一句，不騙你們！”这些话在当时是很能动人的。可是結果到了他垮台的时候，还是欠了薪。并且不是由东北老家带錢来，而是把

北京的錢帶回東北老家去了。

此外我還記得有一次政治風波，也是利用了索薪餉而掀起的。事實大概是这样：直系軍閥于一九二二年直奉戰爭中取得了政權，赶走了徐世昌，以黎元洪代替大總統。實際上曹錕却想登上大總統的寶座，因而在次年夏季就利用了軍警欠餉，主使在北京的軍警向黎元洪索餉，包圍了東廠胡同黎氏私邸。全城警察來了一次總罷崗，同時直系軍閥并以不再負責維持治安對黎威脅。黎就在這種索餉罷崗威脅之下，宣告下野，離開了北京。

北京治安維持會與外交團

一九二八年北伐軍打垮了奉軍，張作霖倉皇退出北京，政府高級官員也相繼逃走，一時北京呈現無政府狀態，人心惶惶，于是所謂北京士紳和商學金融各界人士，就出來組織“北京治安維持會”。這一群人，以王士珍為首，其次的重要主持人有馮恕、史履晉、蔣式惺、周作民、潘毓桂、劉若曾、惲寶惠、錢錦孫、吳炳湘等等，幾乎所有北京各方面的頭面人物，以及商會的首腦，都包括在內。會址設在戶部街財政部烟酒署。組織成立之後，首先即以該會名義，委託吳炳湘擔任警察總監，負責維持治安。因為吳曾做過警察總監，在北京警界中是有威望的。在會議作出決定之後，立刻由諸老擁護把吳送進了警察廳。各區署長也到廳歡迎，表示擁戴。吳宣告暫任總監，同時下令宣布北京臨時戒嚴，施行

宵禁。这时該会的另一件大事是把正在预备撤退的东北一个旅留在北京，負責維持当地新旧交替过渡时间的治安。該旅原駐在西珠市口給孤寺內，旅长鮑毓麟当时顧慮到北伐軍逼近京畿，与东北軍敌对，深恐一旦北伐軍开抵京郊，他这一旅无法安全撤退，不大愿意留下。維持会为了保证鮑旅将来的安全撤退，一面打电报給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說明緣由，請其通告北伐軍前方，于到达北京时准許鮑旅撤回东北，并保证鮑旅不同北伐軍作战，俾北伐軍解除顧慮，一面就由馮恕等亲往东交民巷通知外交团，請他們注意这个问题，并对鮑旅的安全作出保证。这样，鮑旅就安心地留下来了。

北伐軍的先头部队到了南苑和北苑。那时得到消息，据說是山西軍隊譚庆林部队。維持会里有許多与譚有旧的人，认为是譚先来，一切好商量，于是就准备欢迎譚軍，同时欢送鮑旅。鮑旅预备出朝阳門經通州、天津撤向关外。在一天的下午，鮑毓麟整率全旅接受了維持会和北京各界的欢送，在鼓号齐鳴，鞭炮齐放声中，离开北京。維持会和商会还推举了代表预备陪送到通州。我当时担任維持会秘书，也参加了欢送盛典。

鮑旅离京第二天黎明，商会給維持会通电话，說鮑旅走到朝阳門外东嶽庙，即与西北軍韓复榘部队遭遇，当被包围，勒令繳械投降，現仍在相持之中。維持会得到这个消息，才知道先到的并不是晉軍，而是西北軍，感到有些棘

手，于是，立刻召集紧急会议。我记得馮恕在会上首先主张别的且不管，必须赶快通知外交团。当由大会通过，由馮亲往东交民巷向外交团通知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，外交团对北京政府本来就事事干预，碰着这件事，它当然不能放松，当即表示对此事件的关怀，并即由该团派出代表随同维持会的代表一同出城，向韩交涉，要求放鲍旅通过防地，开往天津，并保证它出关的安全。可是韩复榘并不买账，他对代表们说：“无论古今中外，绝对没有对一个敌对的而且已经战败的军队，可以任他全付武装通过防地的。我们已消灭了关内的东北军，更不能保留这一个旅。外交团更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”，相持了几小时，韩军终于因外交团的关系而让步，决定解除鲍旅全付武装，但不俘虏鲍毓麟和他的军官，准许他们随同代表返回北京，其军队则遣送出关。当天中午，鲍毓麟在解除了武装之后，穿着单衣单裤，狠狠地回到了维持会。

商会忙着为鲍制服装，维持会忙着为鲍准备酒饭压惊。我记得在鲍还是衣履不整的时候，外交团由当时的领袖英国公使率领着各国公使，还有武官们和公使夫人等一同来到了维持会，向鲍作了“深切的关怀和慰问”。他们指责韩复榘不讲道理，不尊重外交团。对于鲍旅所损失的武器，他们主张由北京商会负责赔偿，并扬言对这个问题，要向南京政府交涉。鲍除了表示感谢之外，说他留在北京原为维持北京治安，保护外侨生命财产，总算尽到了职责，至于个人的安全，